

试论苏佩斯的“习惯”理论

——基于理性选择的视角

王姝彦^{1,2}, 徐 禄¹

(1.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太原 030006; 2.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 太原 030006)

摘 要:“习惯”在人类思维、认知与行为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关于习惯的哲学探问可谓古已有之。从古希腊至今,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的研究旨趣对习惯所做的种种阐释为习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丰富的概念与方法基础。基于此,苏佩斯将习惯问题置于当代心理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发展情境之下尝试对其加以重解和新探,强调了习惯之于理性选择的基础性意义。尽管其习惯理论尚需进一步的细化、深化,但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其独创性的研究无疑可为在当代科学与哲学语境下对许多传统哲学问题的重思提供一定的思维借鉴与理性指向。

关键词:习惯; 理性选择; 自动性; 期望效用计算; 帕特里克·苏佩斯

中图分类号: N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7062(2020)03 - 0028 - 05

关于“习惯(Habit)”的哲学探问可谓古已有之。在哲学思想史上,自古希腊至中世纪再至近代,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阿奎那(Thomas Aquinas)、休谟(David Hume)等哲学家皆有对习惯及其相关论题的述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其《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一书中对于习惯的细致考察堪称习惯方面的经典研究。此后,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的理论旨趣与方法论框架所做的大量有关“习惯”种种问题的实验或非实验讨论,更是在极大程度上丰富、拓展了与其关联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域面。不言而喻,习惯在人类思维、认知与行为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作为认知过程中所体现的一种习惯自动性特征,许多哲论题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层面的探讨都与其相关。因而,它也成为心灵哲学意识相关研究的重要概念工具之一。此外,随着神经科学、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等在当代的

迅猛发展,对于“习惯”的探讨在心灵哲学、心理学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维度呈现出一定新的面相与特征。正是在此意义上,帕特里克·苏佩斯(Patrick Suppes)在其“心灵(和脑)哲学的修订议项”(A Revised Agenda for Philosophy of Mind (and Brain))一文中,特别强调了当代心灵哲学与脑哲学及其相关领域中一些核心议题的修订,如:计算问题、表征问题(脑表征)、意识问题以及与其相关的习惯问题等等,旨在将其重新定位于目前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中更常见的概念之上^[1]。由此,习惯之于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的基础性意义在哲学与神经心理学的交叉视域下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一 习惯及其自动性特征

人们对于习惯这一概念并不陌生,习惯与人类的思维活动及认知过程密切相关,且习惯特性常常体现于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历史地讲,对于习惯

【收稿日期】 2020-02-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7JJD720005); 山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资助项目(2018052002)

【作者简介】 王姝彦(1974-),女,山西高平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心灵哲学、心理学哲学;

徐 禄(1989-),男,山西五台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

的理性解读与哲学阐发较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对于“什么是高贵和正义”的学习时特别提到了习惯的作用“学习美德,并不仅仅是学习规则的简洁公式或传统格言。它需要一种受过教育的感知,一种超越一般规则应用的习惯能力,用以知道在特定环境中实践美德需要什么。”^[2]他在《政治学》《论灵魂》以及《修辞学》等著述中的相关讨论,在当代亦被一些学者加以引用,用来论证早期关于好习惯学习发展规则的重要性^[3]。其后,习惯问题也得到托马斯·阿奎那的青睐,并对之进行了较亚里士多德更加详细的分析^[4]。再后,休谟也对之给予了较多关注,虽然他很少使用“habit”一词,而更多论述的是“custom”,但其给出的定义与通常意义上的“习惯”非常符合:“我们将一切从过去的重复中产生的、没有任何新的推理或结论的东西称为习惯(custom)。”^[5]此外,休谟还在一定意义上强调了习惯的自动性(automaticity)特征。在他看来,“一般说来,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一切最稳定、最一致的因果关联中,如重力、冲动、固性等等,心灵从不会将其观念明确地用来考虑任何过去的经验:虽然在其他比较罕见和不寻常的事物联想中,通过这种反思,它有助于思想形成习惯和转变”^[5]。毋庸置疑,这些哲学层面所做的思考构成了习惯哲学重要的思想基础与理论基底。

对于习惯最为经典的阐述当属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与哲学维度上的细致论析。依据詹姆斯的观点,习惯减少了我们动作执行的有意识的注意。“人们可以抽象地做如下陈述:如果一个动作的执行需要连续的神经事件链条 A、B、C、D、E、F、G,等等,那么在动作的第一次执行时,有意识的意志必须从众多倾向于呈现其自身的错误选项中一一将这些事件选择出来;但是习惯很快就会使以下情况发生,即每一个事件唤起适合其自己的后继事件,期间没有任何可选择事件提供其自己,并且亦没有涉及任何有意识的意志,直到最后,只要 A 一发生,整个链条 A、B、C、D、E、F、G 就轻快地展开了,就好像 A 和链条的剩余部分被融汇成了一条连续的川流一样。”^[6]¹¹⁴显然,这里已经触及了从有意识的注意到自动性的转变。在詹姆斯看来,习惯并非纯粹是笛卡尔二元论意义上的心理问题,而是与过去和现在的实际表现密切相关。进一步而言,“在其神经细胞和纤维中,分子正在计数、登记和储存它,以便在下一诱惑来临时用来应对他。按照严格的科学字义来讲,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被抹杀”^[6]¹²⁷。

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在詹姆斯的习惯哲学中,神经系统在人们习惯性练习的模式中具有重要意义,习惯简化了用以达到某种既定结果的动作,使动作愈加精确,并减少疲劳。

基于心理学、神经科学以及认知科学的最新发展,苏佩斯立足于当代心灵哲学的视域对习惯及其相关论题进行了重新审理。依据其阐释,除了有些习惯毫无疑问是纯粹的本能,亦即未经学习的并且编码在 DNA 的某处基因中之外,大多数习惯呈现了动物的遗传结构与其生长并持续存在的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即习惯是一种极好的学习例子。关于习惯的特征,苏佩斯对詹姆斯的探讨深以为然,并在其基础上,给出了进一步的分析:其一,习惯是实在的、物理的,习惯应该被看作是某种物理地体现在恰当的神经系统和肌肉中的事物。其二,类似于引擎、锁、铰链以及诸如此类设计事物所具有的一种独特属性,即在一定程度上,这类事物使用得越多,其功能就越好,习惯对于简化动作、减少疲劳、提高效率等方面至关重要。因而在此意义上,基于习惯对于事情具有明显的有益贡献,习惯本身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功利”色彩。其三,与理性选择问题相关,习惯削弱了行动执行所需要的有意识的注意。“在许多经验领域,只有无能的、笨拙的和未经训练的人才能意识到其操作过程。有成就的、有天赋的和受过良好训练的人都不是。选择也是如此。”^[7]¹⁴⁴

习惯作为一种传统的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 or commonsense psychology)概念,苏佩斯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之加以概念或特征方面的考察,而是尝试将其置于当代心灵哲学、心理学哲学以及认知科学哲学的维度,进而将其研究重心重新定位到当前在心理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领域的基本概念范畴之上。在他看来,“心灵哲学应该是一个像物理学一样的学科,在很多方面被科学发现所主导,在此情状下,是关于心理本质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1]。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了对习惯加以哲学探讨的空间。相反,其角色应当转变成为习惯研究的科学结果建立特定的概念基础。而建立这样一种基础本身既是科学的又是哲学的,其哲学性就在于习惯概念可能仍然存在争议,并且在短期内并不会被适当的理论和经验科学发现所澄清。正是在此意义上,意识的无意识本性以及理性选择等问题在苏佩斯的习惯论域之下进一步得到凸显。

二 习惯与思维的无意识本性

质言之,习惯问题通常与思维的无意识本性讨

论密切相关。依据常识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以及民俗理念(folklore ideal),我们对自己的心理概念,即有自我意识的人能够对各种问题进行有意识的、仔细的、彻底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或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思维过程。既往许多关于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合理性的哲学思想和理念也隐含了这一假设。但是,当代许多实验或非实验的心理学调查与研究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即与上述民俗理念与哲学假设相反,“我们几乎完全觉知不到或意识不到我们详细的思维过程。我们所熟知的是思考的结果,往往是部分结果,这些结果构成了对某件重要事情做出最终决定的主要步骤”^{[8]151}。

大体而言,上述相关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关注的是关于个人没有能力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另一类侧重的则是个人对解决问题过程的报告。对于第一类研究而言,回答者往往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喜欢特定的政治候选人;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一种特定的职业;为什么他们选择去读研究生;为什么他们成为失足青年;等等。不难看出,这些调查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回答者在很多时候对其自身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并没有明确的意识。针对此类研究,苏佩斯特别选取了“购买新房子”为例加以详论。按照其论述,对于几乎参与过买房子的每个人来说,选择是一个痛苦和困难的过程,其中会涉及很多影响因素,如学校位置、全部成本、房子新旧等等。但是,即使有这些较显著的要素,对于特定选择的解释还是不够充分,通常只是一般性的,并没有整体决策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最后决定的基础在最终使用、特定限制或细致明确的计算等方面都是不同的。更为重要的是,买房的许多步骤,诸如对不同社区的调查、向中介咨询、办理银行贷款等等,在事实上都只是一些中间结果,却不是相关的思考过程。由此,苏佩斯明确指出,几乎我们所有人都只能描述复杂问题解决的较粗略的中间步骤,因而我们能够意识到的这些步骤往往是一个接一个的阶段性结果而不是我们连续性的思维过程。

就第二类研究来讲,大多聚焦于“创造性解决问题”过程。其中,有的研究表明:通过纯粹的意识计算的创造过程似乎永远不可发生;也有研究表明,无意识的问题解决者通常是在寻求解决方案。例如,在数学中领域,难题的定理证明通常都依赖于想象的飞跃,这与记忆检索非常相似。虽然其在性质上显然是计算的,但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其过程就像对记忆的检索一样,进入意识状态时,根本不知道其

进入前的过程。此过程就如同数学家与科学家的种种科学创造过程。恰如阿达马(J. Hadamard)在其《数学领域中的发明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Invention in the Mathematical Field*)中所言“一个现象是确定的,并且我可以保证其绝对确定性:在突然清醒的时刻一个解决方案会突然地直接出现。”^[9]总之,“从来没有一个严肃的数学家会否认,潜意识过程的这一重要作用实际上总是在取得任何重要的数学结果时奏效”^{[7]139}。由此可见,这类研究也在理论层面为思维的无意识本性提供了有力、有效的论证。

为什么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思维过程的无意识,当代心理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假设以及理论分析,意在对此种无意识性做出恰当的解释。概言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主体思维内容和思维过程的混淆。通常,人们在做决策时,会考虑他们要制定什么样的目标抑或采取哪种手段以期达到某个目标,但是,这样的思维内容其实并非思维过程。其二,是主体自身知识与思维过程的混淆。不言而喻,每个人都对自己有详细的私人知识,而这些知识显然是其他人无法直接获得的。一般来讲,人们在做决策时,这些自身私人知识往往很容易与思维过程相混淆,因为其思维过程无疑是与其关于自身或多或少的私有信息或数据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其三,是主体阶段性思维结果与思维过程的混淆。一个人可以讲述他在任何特定时刻的注意焦点,虽然这与其对思维过程的描述有很大不同,但很自然会与其思维过程相混淆,因为我们不能自然地把我们连续的思维过程与连续的中间结果分开。其四,是主体间歇性感知与思维过程的混淆。不可否认,以下情形经常会发生,即人们在特定时刻可以突然意识到其看到某物,由此也会错过其时的思维步骤。显然,这种间歇性感知是私人性的。但是对这些观察到的对象或事件的记录却极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思考它们的过程。

总之,人们很多动作的执行都不需要事先思考或有意识的思考,其进程往往是惊人地不自觉和顺利地正常运行。正是基于上述不同类型研究结果及其原因的分析,苏佩斯较好地阐释了思维的无意识本性,并且断言“这正是我想强调的。一个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典范风格上的有意识的、慎重的、完整的理性理论,把它作为一个说明我们如何做出关于实际问题的决定或解决理论问题的心理学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7]140}当然,这并不是说意识在这里没有发挥其作用。人们在学习新事物时,通常会有意

识地努力集中注意力,从而控制动作、思想等等,习惯的初步形成在很多方面都是有意识注意的。此外,当人们面临许多选择时,意识的作用是帮助人们思考我们将要做出的选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习惯发挥自动性支配作用时,选择是在无意识中顺利做出的,而当选择不受习惯支配时,意识便会经常发挥作用,即使并不总是如此。无论如何,习惯之于理性选择的意义与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三 理性选择的习惯基础

实践推理一直是哲学及其相关领域关注的一个焦点,对此,而且当代大部分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皆相信一定的理性计算(rational computations)。对于思维过程的分析也是如此,依照其主导思想,人们在做理性选择时,往往与特定的期望效用计算(expected utility computations)相关。这样,一旦存在一个概率分布,思维过程便可由此加以调节,即其在概率理论意义上是严格的。显然,通过使期望效用最大化来进行理性选择的方法有其一定的可取之处。这就类似于某一物理问题可以通过找到一个合适数量的最大值或最小值来解决一样。这也如同我们可以将有机体粗略简化为不复杂的结构,即认为其行为可以最大化。但是,其问题就在于,将理性选择置于计算层面的范围愈加广泛,在形成理论思想时则会遗漏愈多的心理层面要素。

一般情况下,我们做的实际计算是零碎的(fragmentary)、偶然的(occasional)、语境的(contextual),并且由内部和外部的关联所驱动。正如詹姆斯所描述的“我们时而看,时而听;时而推理,时而情愿;时而回忆,时而期待;时而爱,时而恨;在数以百计的其他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的思想是交替进行的。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复杂的状态。”^{[6]230}就人类行为而言,依赖于理性计算在事实上要涉及太多的复杂性,不可能在任何细节上对其进行研究。这些都是进化过程中学习对于人类长期行为的影响。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一种古老的常识心理学术语,习惯在这里似乎比上述期望效用计算形式的最大化功利原则更能在人们的理性选择过程中发挥特定的潜在作用。

更进一步讲,我们的计算是建立在无数的联想之上的,这些联想与我们的过去交织在一起。我们无法对之加以精细的理解,正如我们无法解释我们如何从记忆中检索出某一熟悉的名字抑或某一周知的事实一样。因而,人类的计算具有零碎和联想的特征,其真正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体现在人类的感知

方面,而感知对人类行为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人类的视觉系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仅次于大脑本身。较言之,构建人工视觉系统要比构建数字化计算机相对容易;感知和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要远远高于与对世界可能状态进行直接期望效用计算。由之,苏佩斯明确指出,基于习惯的理性选择阐释比基于期望效用计算的理性选择阐释更为恰当。

20世纪50年代,苏佩斯与分析哲学家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就行为决策问题进行了实验研究,其给出的实验报告表明:被试的信念(belief)与被试的偏好(preference)(行为或生活)不能实证地分离。这也就是说,在事实上,我们的信念只能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得以形成。我们的生活习惯由稳定的经验转化而成,正是基于经验,我们的信念得以被表达为某种预见、未来事件发生的概率,抑或其他。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生活多年形成的信念会随着我们长时间生活环境与生活习惯的改变而改变。由此可以说,我们大多数的信念或信念系统(belief system)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既已形成的生活习惯。与我们习惯形成相应的是,我们脑内神经元网络学习过程逐步进入稳定状态。这样,基于习惯的行为无疑是自发的,因而是无需再进行理性计算的。

基于上述实验结论,苏佩斯分析了习惯对我们所做选择所构成的限制(restraints)。在其看来,我们在选择的过程中,并不会有意地去考虑我们所拥有的习惯。按照他给出的实例:在啤酒和葡萄酒之间,他更喜欢葡萄酒。因而面对菜单时,他通常只考虑葡萄酒的选择,但他并没有对葡萄酒好于啤酒的优点进行任何深思熟虑、理性的分析,因为长久以来的习惯已经形成了这种选择限制^{[7]143}。当然,这并不是说有意识的情况不会发生,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进行理性选择的常规性机制,而习惯作为更恰当的最大化角色便是这种常规性机制的基础,即在习惯的限制下从而最大化我们的选择。苏佩斯进一步表明,一个具有确定性的习惯的熵率为零,但选择的抽象级别将改变熵率,而当习惯的表征水平具有非零熵时,剩下的选择集就会为自由联想留下空间。因此,习惯发挥特定作用之后的下一步就是让当时的联想尽可能自由并容易地做出选择。

结语

总之,苏佩斯基于不同学者对于习惯的讨论,将习惯问题置于当代心理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发展情境之下,并尝试对其加以重解和新探,不

仅强调了习惯之于理性选择的基础性意义,而且在对思维的无意识本性加以分析基础上,进而对于习惯的作用机制给出了一定的阐释。更为重要的是,他将习惯作为论证之一试图最终对“哲学的神经心理学基础”这一重要议题做出其说明^[8]。(其他相关论证还包括:真理计算^[10]、贝叶斯先验^[11]、非形式数学证明确证的心理学本质^[12]。)这一“愿景”无疑具有重要的开拓性价值。尽管,苏佩斯的习惯理论在很多方面(如:自由联想的可塑性、如何区分习惯和自由联想等问题)尚需进一步的细化、深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其独创性的研究无疑可为在当代科学与哲学语境下对许多传统哲学问题的重思提供一定的思维借鉴与理性指向。

【参 考 文 献】

- [1] SUPPES P. A revised agenda for philosophy of mind (and brain) [M]//FRAUCHIGER M, ESSLER W K. Representation, evidence, and justification: themes from Suppes. Frankfurt: Ontos Verlag, 2008: 19.
- [2] ARISTOTLE. Nichomachean ethics [M]//MCKEON R.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1: 1109b23, 1126b2 - 4.
- [3] SHERMAN N. The fabric of character [M]//SHERMAN N. Aristotle's ethics.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9.
- [4] AQUINA T. Summa theologica [M]//REGIS A C. Basic writings of Saint Thomas Aquina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4: Vol. 1.
- [5] HUME 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M]//JOHN N. Quotations taken from L. A. Selby - Bigge's edi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104.
- [6] JAMES W.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8.
- [7] SUPPES P. Rationality, habits and freedom [M]//DIMITRI N, BASILI M, GILBOA I.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8] SUPPES P. Neuro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philosophy [M]//HIEKE A. Reduction: between the mind and the brain. Frankfurt: Ontos Verlag, 2009.
- [9] HADAMARD J. The psychology of invention in the mathematical field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5: 8.
- [10] SUPPES P, BEZIAU J - Y. Semantic computations of truth, based on associations already learned [J]. Journal of Applied Logic, 2004 (2): 457 - 467.
- [11] SUPPES P. Where do Bayesian priors come from? [J]. Synthese, 2007, 156(3): 441 - 471.
- [12] SUPPES P. Psychological nature of verification of informal mathematical proofs [M]//ARTEMOV S, BARRINGER H, GARCEZ A S, et al. We will show them: essays in honour of Dov Gabbay. London: College Publications, 2005: 693 - 712.

On Suppes' s Theory of “habi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ational Choice

WANG Shu - yan^{1,2}, XU Lu¹

(1. Research Center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2.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Habit” has importan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n human thought, cognition and behavior. The philosophical inquiries about habits have been around since ancient times. From the ancient Greece to the present,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habit made by different scholars based on their own research purposes have laid a rich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abit theory. Based on this, Suppes tried to re-interpret and explore the habit problem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neuroscience, cognitive science and other disciplines, emphasizing the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of habit in rational choice. Although his habit theory needs further refinement and deepening, in a more profound sense, his original research can undoubtedly provide a certain way of thinking and rational orientation for the rethinking of many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philosophy.

Key words: habit; rational choice; automaticity; expected utility computations; Patrick Suppes

(责任编辑 魏屹东)